

效率·稳定·民主

——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演进的若干问题

EFFICIENCY, STABILITY AND DEMOCRACY

——SOME PROBLEMS I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EVOLU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曹远征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既面临着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又面临着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的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的问题。这两重任务集于一身,使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状态呈现出有别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特殊性,从而具有中国特色。因此,除了要从改革的角度认识中国问题外,尚需从发展的角度丰富这一认识。鉴此,就要从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演进的过程中获得借鉴。

工业化的进程与体制分化

所谓发展中国家是相对发达国家而言的。这里包含着两个相互联系的内容,即发达国家的先进性和发展中国家的落后性。

人类经济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发达国家的发展为发展中国家展示了前景。这一前景用现代语言表达,就是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的工业社会。这一发展包括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观念等各方面的现代化的进程,而其中的核心内容便是工业化。

但应当指出,由于世界经济系统的演进,时间、条件都已发生了变化,它使当代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已远不同于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阶段。一般地讲,与发达国家早期发展阶段相比,当代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起步时就具有以下初始差异:

1. 起步动力上的差异。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

工业化是在特定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以自然萌生的商品货币关系为前提,以文化观念的更新(启蒙运动)和政治制度的更新(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为先导,建立起和大工业生产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结构,推动了工业革命。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工业化。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则基本上是在外力推动下起步的。这一起步是在多少缺乏社会结构的更新和文化观念的更新的基础上进行的。于是与大工业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和政治制度的更新只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进行。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无一例外地提出体制改革的任务。

2. 起步积累上的差异。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起步前就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国内外原始积累。工业化起步后,资本的正常积累又进一步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资本的积累规模和能力都大大提高。而在此时起步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工业化的第一推动力——原始积累不足,另一方面这一弱小的原始积累又成为发达国家资本正常积累的一个源泉,使其现实的积累更显不足。

上述两个差异集中起来便是现实资本积累的不足与强烈追求工业化的要求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点。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及其问题盖出于此。

应当强调指出,所谓发展中国家现实资本积累的不足,不仅是指其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性所带来的资本总量积累不足,而且更是指其经济政治体制的不成熟性而产生的资本积累不能深化的机制。换言之,市场未发育或发育不足,企业家

曹远征(Cao Yuanzheng)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比较经济研究室副主任,经济学博士。

阶层未形成，与商品经济有关的现代观念和政治体制未成形或不完善，从而使其资本积累的主体与积累的条件均处于模糊之中。

显然这种处于混沌初始状态的体制必然会在民族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产生分化或创新，否则无法成为经济发展的体制依托。目前看来，战后发展中国家体制的分化或创新大致是沿着三个方面发展的：

1. 苏联体制模式影响下的党政军高度合一的命令性体制。采取这种体制的国家有70年代前的埃及、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坦桑尼亚等。

2. 西方体制模式影响下的三权分立的市场经济体制。采取这种体制的国家有印度、70年代前的智利、土耳其等。

3. 名不见经传的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下的市场经济体制。这类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是上述两种体制的混血儿。采取这种体制的国家和地区有巴西、南朝鲜，我国的台湾省等。

经过战后四十年经济发展的实践，呈现出这样一种结果，似乎第三种类型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上尽管存在许多问题，但总的状况比前二类国家要好。事实上，第一类国家在70年代后就开始强调开放、改革，而第二类国家也有迹象在向第三种模式靠拢。这不能不使人们更深切地关注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阶段的体制依托问题。

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下的 商品经济体制

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问题，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遇见的第一障碍是储蓄水平低，资本匮乏。为充分动员社会资源，显然需要有国家的力量。再加上发展中国家企业家阶层未形成，投资主体的责任也多半落在国家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某种程度的国家集中或计划看来是必然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强调计划化问题。但在这里遇到的问题是，如果过份强调政府的作用，以致由政府代行微观经济的作用，企业家阶层就无法生长起来，反而可能窒息经济发展的活力。政府计划的必要性是和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随着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过度集中的命令性经济无法满足效率提高的要求。埃及与阿尔及利亚的情况就表明了这一点。

通过多年实践，人们已认识到市场竞争机制对提高效率，增强经济活力具有不容置疑的作用。然而，由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起步时，经济单位的初始规模都很小，在资本匮乏条件下的小业主的竞争很可能是一种低水平的过度竞争。对这种

竞争如不加以引导，不仅会增加资源的浪费，而且很难有利于技术的进步。低效的市场通常是和低效的政府相联系的，一个政府如不能对社会改革加以引导，就不可能提高市场的效率，并会拖长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印度的情况就表明了这一点。

因此可以认为，单纯模仿苏联或西方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其不成功的原因就在于未充分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

相反，战后三十多年的经验证明，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下的商品经济体制却能基本满足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要求。这种体制以商品经济为前提，在此基础上，政府通过对市场的间接干预并根据中长期产业政策的指导，引导企业按着预定的方向发展，从而加速产业结构的变化，缩短经济成长过程。从断面上看，是一种政府控制市场、市场导向企业的间接性体制。其优点在于将市场的活力与政府的干预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既保证了结构变动的要求，又保证了效率提高的要求。

更为重要的是，除上述特点外，这种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商品经济体制尚具有保证在经济结构变动中稳定社会的作用，由于这一作用，使经济发展能成为一个连续的过程，从而使完成发展成为可能。

发展中国家都有强烈追求工业化的愿望，但由于社会不发达，人们对工业化可能付出的代价往往估计不足，因此，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当经济结构急剧变动而引致社会结构的相应变化时，常常会出现一些始料未及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为维持社会的安定，需要一个有权威的高水平政府来调解处理这些矛盾和冲突，以避免因社会动乱而中断经济发展。因而，一个强有力的权力相对集中的政府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总结战后四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到，在高速发展中，因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动可能会在下述几个方面种下社会动乱的种子：

第一、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商品经济发育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家形成的过程。随着有经营才能的企业家的出现和发展，必然使原有的社会结构出现分化，并相应地出现分配格局的迅速变化，收入差距及其扩大化的问题。特别是某些国家对私人经济的发展采取鼓励政策，收入差距问题可能会进一步突出。在纯经济学意义上讲，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种收入差距的出现乃至拉大实属不可避免，它也有助于推动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也只能为收入差距问题的解决提供基础。即所谓收入均等化随经济发展呈U型变化的现象。但是，这和传统经济的条件下，人们形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意识

难免形成极大冲突，并因之成为社会不稳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物价上涨问题。发展中国家因其落后性在经济上一直存在着供给的“瓶颈”，再加上人均储蓄低，资本匮乏等因素，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似乎是一种常态。经验表明，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常伴随着通货膨胀。特别是那些企图通过产业政策干预以加速结构高度化的国家，通货膨胀率更高。而通货膨胀显然加剧了各阶层收入分配的差距，招致人们，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愤恨，并因之成为社会动乱的一个温床。

第三、官员腐化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受发达国家物质丰裕的消费示范的影响，人们都渴望在较短的时期内尽快地富裕起来。这种欲望膨胀客观上对官员形成心理上的压力，而官员手中的权力又是满足其个人富裕欲望的最便利的工具。在这种条件下，一旦一些意志薄弱者率先以权谋私，便可能形成“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情形。而腐败之风的兴起，不但会削弱政府的行政效率，更重要的是，它会导致增加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加剧社会离心倾向，因而是破坏力极大的因素。

第四、国际收支恶化问题。在当代条件下，民族意识一直是发展中国家振兴经济的凝聚力。而与此同时，由于其资本匮乏，引进外国资本又成为加速经济发展的手段，再加上由于其后进性，进出口结构不对称，出口是低附加价值为主的初级产品，进口又是高附加价值的工业制成品，其结果国际收支恶化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初期是屡见不鲜的。这一恶化，特别是外债负担的加重极易导致民族情绪的高涨，特别是在一些民族主义气氛浓重的国家，极易因之成为社会动乱的温床。

经验表明，所有能保证经济发展势头的发展中国家都是对上述问题处理较好的国家。而这些国家又多具有一个有权威的政府，而这一有权威政府的权力来源多半不是来自议会，而是来自组织化的力量，军队或政党。与此同时，必须说明的是，这一有权威的政府又是一个专家化的政府。没有专家化无助于错综复杂问题的趋利避害式的解决，而没有权威则无助于社会的稳定。换言之，政府的权威是必要条件，而专家化是充分条件。否则，则可能是一种专制独裁，这在发展中国家也不是没有经验教训的。

经济民主化与政治民主化

现代化包括一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在社

会物质福利增长的同时，提高社会成员对公共事业的参预程度，改善政治制度，即民主化，应是现代化的更为重要的目标之一。在发展中国家，许多人都提出过这一问题，并试图将其付诸实施。然而，即使我们肯定这一发展目标，我们也会发现它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是达不到的。模仿西方代议制民主或自创的其他“民主政体”，如南朝鲜的李承晚政府、智利的阿连德政府、土耳其军政府前的19届政府均以失败而告终。

上述事实出现的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并因之可以得到见仁见智的解释，但其中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特定历史阶段中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差距是如此之大，以致构成一种质的障碍，通过正常的议会程序进行谈判几乎无法解决问题，进而导致“民主政府”的瓦解。道理非常简单：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当代经济发展的过程都是由二元经济社会走向工业化一元经济社会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极大地影响着发展中国家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在传统的一元分化为二元时（不论二元的产生是萌发的还是嵌入的），分布在这二元中的经济活动就不是受同一个规律的支配，从而导致其政治活动不受同一原则支配。一方面既有利益集团要捍卫旧有的社会结构，而另一方面新兴的利益集团则要以摧毁旧有的社会结构为条件。这种利益格局在政治上的表现便是在那些“民主政体”的发展中国家中，政党对立，形成从极左的政党到极右政党的连续分布。如此巨大的利益鸿沟难免不造成议会中旷日持久的争吵。特别是在根本利害关系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既定的政治规则就失去了效力，代之以诉诸武力，最终导致“民主政体”的垮台。事实上，李承晚时期，阿连德时期以及土耳其军政府前19届政府时期，均伴随着暗杀、枪战和各种恐怖活动。这种情况反过来说明，混乱后有权威政府的产生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从而具有必然性。

应当指出的是，这并不是意味着在发展中国家，政治民主化是绝对不可行或达不到的。而仅是指政治民主化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伴随经济发展而发展的过程。实际上，传统一元自然经济结构变成二元时，就表明有一个有别于传统行为方式的新经济主体出现，而这一新的经济主体如果按市场原则活动的话，那么也就标志着经济民主化的开始，而这一民主化必然或迟或早要引起上层建筑的某些相应变化，从而开始政治民主化的进程。这里想要说明的是，上层建筑是相对独立于经济基础的，从而二者进程会有时滞。它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有阶段性的差异，

（下转第27页）

超过 10^{-44} 秒,即不可能测量比 10^{-44} 秒小的时间间隔。类似地,长度测量精度也不可能超过 10^{-33} 厘米,即不可能测量比 10^{-33} 厘米小的距离。

由物理学方法论,一个原则上不能直接或间接测定的物理量,在物理中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说,在小于 10^{-44} 秒和 10^{-33} 厘米的范围内,时间和长度概念将失去意义。由时间和长度派生出来的其他概念,也随之失效。总之,引力与量子二者的结合将导致时空概念本身的改变。这就是量子引力论面对的难题之一。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已经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这里只简单地列举一下:正则量子化,协变微扰理论,欧几里得量子引力论,弯曲时空中的量子场论,诱生引力论,几何量子化,缠绕子理论,离散引力,曲率平方理论,非线性量子力学,自旋网络,渐近量子化,量子宇宙学,超引

力理论, K-K理论以及近年最热门的超弦理论。

今天我们还不可能对这些尝试作进一步的评论。也许只能说,量子引力论的成功,大概需要各种尝试的协同努力。

引力物理的开放

笔者正在参与明年将在美国科罗拉多举行的国际广义相对论及引力学会第十二次大会的组织工作。一位资深的同行说:“在这个学会刚刚建立的时候,经典广义相对论是个多产而独立的领域,学会本身也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科学家‘圈子’。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其他两个强有力的‘圈子’中的物理学家,即天体物理学家及粒子物理学家已经大量涌入引力物理研究”。

的确,这是一种趋势。回顾一下引力物理的发展史,从牛顿到爱因斯坦,引力物理的确有一系列影响着物理全局的创造。但

是,由于引力是自然界最弱的相互作用,所以,就具体研究来说,引力物理一直是个独立的即相当孤立的领域,它与其他物理分支的联系极少。但近二十年来,渐渐改观了。一方面在宇宙学和高能天体物理中,引力物理和高能物理、天体物理之间难于划界了。另一方面,在微引力物理中,引力也开始进入凝聚态物理和材料科学。

对这些交叉领域中的课题,我们不再讨论了,一一列举也不必要了。当然,不列举并不表明它对引力物理不重要。相反,引力物理的未来,也许正是在引力物理的这种开放式发展之中。

参考文献

1. Physics Through the 1990s, Gravitation, Cosmology and Cosmic-Ray Physics,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6).
2. 方励之, 物理, 16, (1987), 481.
3. 方励之, 物理, 17, (1988), No. 5.

(上接第10页)

而不能把更远的目标当成中近期目标来对待。所谓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下的商品经济体制恰恰是这一时滞的表现,它有利于经济发展并为政治民主化提供了先决条件。南朝鲜和巴西的经验似乎就表明了这一趋向。1961年朴正熙军政府建立时,人均国民总值只有87美元,到80年代达到3 000美元后,全斗焕政权不得不进行了转轨,由“政府主导”改为“民间主导”,80年代中期后,又不得不让位于“民选政府”。巴西1964年军政府上台后,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20年后,军政府已让位于“民选政府”。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的某一特定发展阶段,不仅是经济,而且是政治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的阶段目标是经济发展,而为了保证这种经济发展不至于被内外因素所打断,社会的相对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唯有这样才能为政治民主化提供基础。而要想缔造这样一种局面,使经济社会发展有序地进行,在这一发展阶段,较佳的体制模式是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下的商品经济体制。

(上接第29页)

交换裂距与温度的关系;研究玻璃态非晶材料的结构和几个分子层厚的液晶的相变;研究表面的结构和催化活性;可在光刻蚀中产生线度小至70 Å的人造结构。目前同步辐射已成为广泛实验领域的最有用的工具之一。

11. 原子级分辨率的实验探测 在过去10年,实验研究凝聚体仪器方面的主要进展是发展了几种能观测单个原子的探测器,其中一种是扫描真空隧道显微镜,它的原理是利用电子的量子力学隧道效应,由此效应产生的电流对于从探针到样品的距离是很敏感的。现在已可利用这种仪器直接观测样品表面原子级的结构。另外的一些进展是1982年生产了分辨率达到约1.5 Å的透射电子显微镜,可以研究沿电子束方向的样品内线型和平面型缺陷,也可研究完美晶体的薄膜样品的原子位置;还研制成了分辨率约2 Å的扫描透射电子显微镜,利用它可以得到碳膜中的重原子象。可以期望将来这些仪器可越来越多地用来直接测定固体内部和表面的原子位置。